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4.1

4 issues a year in 14 languages

Simon Clarke –
啟發性的合作

社會學志業

Alain Touraine,
Kalpana Kannabiran

智利民主轉型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烏拉圭社會民主

Felipe Arocena,
Adriana Marrero
and Leandro Pereira,
Marcos Supervielle
and Mariela Quiñones,
Diego Piñeiro

匈牙利向右轉

György Csepe,li,
Eszter Bartha,
György Lengyel

- > 南非女礦工
- > 象牙海岸的手機文化
- > 歐洲社會學會議
- > 拉美社會學會的最後宣佈
- > 社會轉型和數位時代
- > 俄國團隊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4卷 / 第1期 / 2014/03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主編的話

反抗新自由主義

我們活在一個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市場無遠弗屆，所到之處，所有的領域無可倖免。從所謂的創新勞動變成了更不確定的生存法則；從金錢交換制度變成了用錢滾錢的遊戲，讓富者更富，窮者更窮。從生命、自然等的維護都被資本主義所侵略，然後變成商品，鼓勵掠奪。曾經是公共財的知識也變成了學生取得文憑的工具和企業取得研究資金的手段。商品化是一個惡性循環，且看不到盡頭。

可是市場也產生了反作用力，像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管制。這個議題在本期內關於烏拉圭的四篇文章可以看到他們如何對全球市場化做出回應，包括的重分配政策、墮胎合法化、同志婚姻、大麻的社會政策，以其公共教育。資本主義另一方面也侵蝕了農業，讓農業社會變成了資本積累的工具。第二任的執政黨社會主義聯盟包括了一些前游擊戰的成員，他們正推動社會民主，和智利截然不同。儘管在選舉上，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委內瑞拉、玻利維亞也都有社會主義政黨執政，可是烏拉圭相對比較人道和成功。

若烏拉圭是拉丁美洲的特例，那麼匈牙利就是前蘇聯集團的特例。但這個特例的意義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威權民粹主義，另一種回應市場的方式。所以三篇關於匈牙利的文章描述了黑道國家的興起，如何由 Viktor Orbán 所把持，和烏拉圭總統 José Mujica 謙遜的一生完全不同。匈牙利政治精英傷害民主和公共辯論，讓階級的概念喪失信用，扭曲，並且用民族沙文主義反對猶太人和 Roma 族群，並把歐盟當作是代罪羔羊，把匈牙利經濟蕭條推給他們。

這兩個國家有非常不同的經濟和政治背景，所也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回應也大相逕庭。但是不論社會民主或是民粹威權，他們有辦法阻擋甚至翻轉市場化的趨勢嗎。新自由主義的翻轉需要包括國家層次和全球層次的運動，而那又是什麼？這種運動會擴大或是限制了自由？我們會成功嗎？還是會走向集體毀滅？



Simon Clarke正接受兩位他的學生的訪問。訪談內容關於其與年輕有才氣的俄國社會學家合作，研究市場轉型的許多案例。



Alain Touraine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社會學家，描述其革命性的理論以其創新且廣被接收的方法論，主要在社會運動領域。他早期是樂觀主義者，近期則成為悲觀主義者。



Kalpana Kannabiran傑出的社會學家，同時也是印度的社會運動者。他正在描述社會學和批判法學之間可能的共生關係，以及如何促進社會正義。

全球對話以 14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編: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Celia Arribas, Rafael de Souza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ajmeh Taheri, Faezeh Khajehzade, Nastaran Mahmoodzade, Saghar Bozorgi, Zohreh Sorooshfar.

日本:

西原和久、芝真里、姫野宏輔、高見具広、岩館豊、池田和弘、福田 雄、三部倫子、堀田裕子、小坂有資、小杉亮子、土田久美子、仲修平、加瀬希和子、大森美佐、毛塚和宏

波蘭: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Adam Mue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Emilia Hudzińska, Kinga Jakieła, Julia Legat, Kamil Lipiński, Konrad Siemaszko, Zofia Włodarczyk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Monica Alexandru,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Miriam Cihodariu, Monica Nădrag, Cătălina Petre, Mădălin Rapan, Lucian Rotariu, Alina Stan, Mara Stan, Balazs Telegdy,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ş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戀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Zeynep Baykal, Gizem Güner.

烏克蘭:

Svitlana Khutka, Olga Kuzovkina, Anastasia Denisenko, Mariia Domashchenko, Iryna Klievtsova, Lidia Kuzemska, Anastasiya Lipinska, Myroslava Romanchuk, Ksenia Shvets, Liudmyla Smoliiar, Oryna Stetsenko, Polina Stohnushko

媒體顧問: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編輯顧問: Abigail Andrews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反抗新自由主義 2

與俄國社會學家的合作

An Interview with Simon Clarke, 英國 4

社會學志業：超越社會學之外

by Alain Touraine, 法國 7

社會學志業：法律和社會的對話

by Kalpana Kannabiran, 印度 9

民主轉型的挑戰

An Interview with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智利 12

> 烏拉圭的社會民主

走在拉美前端的烏拉圭

by Felipe Arocena, 烏拉圭 15

烏拉圭公共教育的公共性

by Adriana Marrero and Leandro Pereira, 烏拉圭 17

烏拉圭奇蹟：重分配和工會

by Marcos Supervielle and Mariela Quinones, 烏拉圭 19

烏拉圭的農業革命

by Diego E. Piñeiro, 烏拉圭 21

> 匈牙利向右轉

匈牙利黑道國家的興起

by György Csepeli, 匈牙利 23

當代匈牙利的階級命運

by Eszter Bartha, 匈牙利 25

精英的(不)負責

by György Lengyel, 匈牙利 27

> 田野筆記

南非：地底下的女礦工

by Asanda Benya, 南非 30

象牙海岸：手機的象徵資本

by Jordanna Matlon, 法國 33

> 會議報告

歐洲社會學會議

by Jennifer Platt, 英國 35

最後的宣佈

Adopted at XXIX Congress of ALAS, 智利 37

社會轉型和數位時代

by Elisa P. Reis, 巴西 39

俄國編輯團隊

by Elena Zdravomyslova, 俄國 40



> 與俄國社會學家的合作 的啟發性

訪談 Simon Clarke

在1980年代，英國 Warwick 大學的社會學者 Simon Clarke 是一位很著名的理論家，特別是其原創性對於馬克思的詮釋以及對於現代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基礎的批判。1990年代，Clarke 到了蘇聯，從此開啟了另外 20 年的新研究生涯，和許多國外學者合作。他是俄國社會學其中一個新學派的主要推手，關心社會的大轉型。他和同事 Peter Fairbrother 一起建立了俄羅斯研究者的網路，成立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abour Relations Research (ISITO)。在這裡，Clarke 和俄國學者生產了很多研究，分析經濟改革對於勞動和家庭的影響，以及勞工和組織的回應。這些研究在規模、深度、原創性上，都非常傑出，也對支配性的新自由主義提出很大的挑戰。ISITO 的文化也值得提出來。若是蘇聯的階層和支配組織是其特色的話，那麼 ISITO 是一個由 Simon Clarke 管理的合作平台，以信任、友情、互惠學習為原則。這篇文章是其兩位學生 Sarah Ashwi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和 Valery Yakubovich (ESSEC Business School, France) 所訪談。

Valery: 從晚期 1980 年代開始，許多西方社會學家到蘇聯去觀察「自然實驗」，研究社會變遷，但很少人成立新的研究機構。你怎麼想出這個點子的？



Simon Clarke和來自Samara的知名社會學家。

SC: Annie Phizacklea 和我在 Warwick 大學找了一批學生到俄國。那時是 1990 年 3 月。我馬上被這些新的機會吸引了。很偶然的我遇到了 Svetlana Natalushko，他負責進階社會學課程，是由 Galina Mikhalyova 所資助，在 Higher Komsomol School 進行（後來改名叫做 Institute of Youth）。在沒有民主選舉的情況之下，民意調查成為了重要的工具，特別是在 80 年代的重建時期對於黨和工會組織想要取得權力來說，很重要。所以很多想要發展其社會知識的運動者會到 Moscow 來唸社會學，因為那裡相對進步。後來我被邀請回去上了一個星期的課，記得是 12 月的時候，

>>

學生有 Vadim Borisov 和 Olga Rodina，他們後來是 ISITO 的核心成員。隔年的 3 月時候，Peter Fairbrother 和我帶了一批學生，和更多的年輕社會學家見面，我想包括了 Valery Yakubovich，還有 Vladimir (‘‘Volodya’’) Ilyin 和 Petr Bizyukov，另外還和一些勞工運動者會面。

在那個時候，像你說的，許多西方社會學家都在蘇聯開始其研究，但是許多人其實室外包收集資料的工作給蘇聯的研究單位，調查機構，或是研究生，他們可以生產出大量便宜的資料（質化在蘇聯被認為是不科學的），或是引用他們的舊的研究報告。但我們對於分析二手資料並不感興趣，因為我們認為不可靠，所以想自己收集資料。而一個明顯的阻礙是時間和語言，但是 Vadim, Volodya, 和 Olga 可以當翻譯者，幫助我們進行訪問。然後我們也有非常感興趣的田野研究者。我們和那些想要合作的人見面，解釋我們的計畫，不過我們很清楚表示沒有資金。這足夠區別出那些想要錢和想做研究的人。最後研究團隊在 Moscow, Syktyvkar, Samara, 和 Kemerovo 成立了，領導的人分別是 Vadim Borisov, Vladimir Ilyin, Irina Kozina, Petr Bizyukov, 和 Veronika Kabalina。

後來我們在 Perm, Yekaterinburg, St Petersburg, Ulyanovsk, 和 Ivanovo 建立了研究團隊。整個團隊以成員的友誼和信念為基礎，起初並沒有什麼制度的架構，但是我們很堅持要有要一個研究空間，因為在蘇聯解體之後，原本的制度不會延續，但是我們成員研究需要基礎，所以需要有一個制度上的同一性，合作才有可能。最後在歷經許多的官僚層級之間的努力與失敗之後，我們建立了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Labour Relations Research (ISITO)，作為一個非營利的社會組織，有銀行帳戶，有管理委員會，執行長、帳務人員，並且繳稅。不過整個研究團隊還是以友情、合作、信念為核心去運作。

Sarah: 如你說的，質化在蘇聯被認為不科學，所以 ISITO 的成員有田野的訓練嗎。還是你訓練的？

Valery: 我記得儘管這個「不科學」的名聲，質化研究在俄國則是廣被接受了，特別是在 1990 年代。你覺得沒有質化的方法，什麼東西最有可能被忽略？

SC: 我們設立研究中心時，我們和許多 Mos-

cow 的社會學家討論了質化的議題。他們堅持在俄羅斯沒有社會學家，只有田野研究者。社會學分列成社會哲學者和社會研究者。社會哲學者認為自己是唯一的社會學家，並其實從馬克思列寧主義轉型到西方社會哲學，非常順利。他們對經驗完全不感興趣。社會科學家則堅稱雖然質化方法（軟方法）有些推論的價值，但是只有量化（硬方法）是科學的。可是，我們遇到的年輕社會學家中，特別是俄羅斯來的，其實都對質化方法有興趣。這或許是資源稀少的關係，因為他們其實很難在 Moscow Institutes 之外拿到研究經費。所以沒有人會做質化。但是也因為他們對於蘇聯對於量化研究的崇拜和政治化感到厭煩了，所以沒人相信政府官方的量化研究，這在年輕一輩的批判學者中特別如此。

而當我們開始我們的計畫時候，我們開一個為期 3 天的會議討論質化方法。那時在 Moscow 的一個傳播部的 dom otdykha（渡假小屋）裡面，但我們睡在很冷的小木屋裡面。主要的結論是質化方法必須嚴謹和系統化。Peter Fairbrother 帶領了質化方法技術部份的討論，指出要有適合和足夠的紀錄器材去寫田野筆記和訪談，這個討論很令人印象深刻，每個人都很興奮地掌握了質化的根本原則。

許多我們的研究適用比較個案法，特別是那些工業研究。每一個研究團隊負責幾個個案，然後彙整。我主持一開始的討論，所有的研究者來參與，然後決定要訪問什麼，像是資深經理人、廚師、工人等，以及什麼樣的調查可以進行，像是參與觀察，坐在商店裡面或是加入工會。然後我們有一個訪問大綱，針對每一個受訪者類別，準備一個格式，讓大家寫報告。這個方式我們盡量去確定所有的個案是在可比較的基礎上進行，每個報告、訪談稿、田野筆記等都跟每個人公開，然後討論。每個個人公開，然後討論。記等越會開會一次，團隊領導要檢視工作進度；然後每年有一個大會議要去形成假設的論證，去測試每個個案。最後的會議每個計畫都要是以分析性的文章出現，然後以此用俄文或是英文出版。

我很懷疑若是沒有質化研究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洞見。人們都知道在蘇聯和俄國時代是怎樣，可是現在這個知識並沒有被系統化的整理和紀錄。若沒有質化，我們不知道要問什麼問題，不知道問卷怎麼設計，怎麼解

釋資料。量化只可以提供最後階段的分析，讓我們去找推論我們的發現。我們不反對量化，但是我們很懷疑現有的們不反對量化，但是我們很懷疑現有，俄國量化資料有多麼可行，特別是我們許多研究者幫政府收集過資料，知道那些資料如何被生產出來的。而且我們發現了很多資料上的不一致性。

我對於現有資料的不滿意促使我去找資源支持我們自己做勞動市場調查。主要是在1998年的4個核心地區，由Valery Yakubovich所主持，有很嚴謹的抽象、訪談、檢驗。

Sarah: 你和 ISITO 合作相當多產，出版了18本書和55篇英文文章，也有無數的俄國出版品。其中最讓你興奮的是什麼？

SC: 一開始我們研究新工人在轉型期間成為領導的這個現象，而也想找出支持民主和工會與工人運動的機制。我想許多研究發現其實是令人沮喪而非高興的。因為在蘇聯解體的集體亢奮之後，任何事情都被認為有可能發生，但是我們必須在新自由主義席捲全國後而且拒絕改變其傷害人民生活之前，去面對我們的幼稚想像。因為那些希望多半是象徵性的，根本沒有實質影響，特別是傳統工會。而新的工會也腐敗了。當然還有其他反抗的個體，可是也很快就在壓迫下瓦解了。

多數的研究很嚴謹的建立再過去的經驗和觀察上，但是還是有很多新的發現。我們其中一個計畫是問什麼讓俄國工人努力工作？Sergei Alashev 的假設是「俄國工人喜歡工作」，一聽到或許覺得好笑，可是他出版的文章 (Management and Industry in Russia: Formal and Informal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1995) 有很棒的解釋。

從科學的觀點來看，我想最有趣的發現，包括了蘇聯文化的實做脈絡，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經被很多人也看到了。我們的研究特別關注工會、工業管理、零售商的文化，但是這些現象可以在傳統國家結構的再建構上都可以看得到。

有些很驚訝的發現是從1998的家戶經濟調查而來，那裡有品質很高的量化資料可以驗證很多假設。其中一個發現是 Kermerovo 的 Lena Varshavskaya 發現的，家庭農業並非外界所宣稱的是窮人的終身工作，因為家庭農業的時間和金錢成本使得根本入不敷出，反而和連續性論證一致的是，那是休閒活動，反應了蘇聯的倫理、自然的理念、以及交換的傳統。

另外一個關鍵的發現是制度對於市場如何決定工資差異的支配。這發現強烈支持傳統的工業關係主張，反對勞動經濟學者的論點，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解釋國內有給和無給勞工的差異。對我來說，因為我曾經是經濟學家，這些是我很滿意的發現，因為我覺得主要的社會科學則認識是去挑戰古典經濟學的虛假科學外衣，去掀開其危險的預設。

Valery: 那 ISITO 現在的情況呢？

SC: ISITO 是一個歷經液態化的組織，因為俄國對於管理和財務的報告要求非常花錢和花時間，但是非正式的連結還在。某些意義上，ISITO 是其自身成功的犧牲者。成員變成了頂尖研究和教學的搶手人才，多數人還是持續其研究。我們在今年3月會有最後一場 ISITO 的會議，可能會在埃及。ISITO 的出版品可以到這裡：www.warwick.ac.uk/russia



> 超越社會學

by Alain Tourain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法國, ISA副會長, 1974-78

40多年來，Alain Touraine是社會學裡的大師級人物。他從工業社會學出發，然後在社會運動理論裡大放異彩。他的研究認為社會是集體自我創立的，這觀點啟發了許多新的社會學介入方法論。他也是具有全球觀點的社會學家，總是關心世界各個角落的自由與尊嚴的社會運動。他著作等身，包括了The May Movement of Utopian Communism (1968),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1969); The Production of Society (1973), The Voice and the Eye (1978), Solidarity: The Analysis of a Social Movement: Poland 1980-1981 (1983) (with François Dubet, Michel Wieviorka and Jan Strzelecki), The Return of the Actor (1984), 和最近的The End of Societies。他在EHESS設立了自己的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and Intervention，並訓練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Alain Touraine.

我對社會學的初衷，也是長期以來的信念，其實就是來自於對學校教育的不滿。學校體系只注重如何維護和再生產其本身的規範，卻對如何滿足學生的知識需求不太在乎。我是個特例，我在學校不高興也不成功，最後拒絕聯考，於是進入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在兩年過後，我離開了這間好學校，在中歐花了一年，當一個兼職的煤礦工。

Georges Friedmann 歐洲工業社會學的主要建立者，他邀請我加入一個團體，

而那些主要研究職業如何在不同的工業與科技下變遷。他讓我負責法國的汽車公司：Renault。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去學習整個工作的細節和組織的結構，到過每一個廠房。同時，我通過了考試成為了歷史教授，不過因為 Friedmann 我也成為了社會學的全職研究者。他很職禮貌成為了的貌成為了告訴成不論我在那個考試失敗或成功，我都會給你這份研究工作，因為我們需要新血的加入。

在幾年後離開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CNRS)，到了美國的哈佛、哥倫比亞、芝加哥大學等校，並在智利住了一年，那裡我創立了工業社會學研究中心。更重要的是，我和一位智利生物學家結婚了。那時我 34 歲，已經是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的正教授。我接下來的學術生涯都在此度過，除了幾年我到過拉丁美洲，UCLA, Berkeley, 紐約的 New School。

1966 年我對體制學術系統的敵意讓我加入了 University of Nanterre，那在靠近巴黎的地方。我當時並沒有了解到我正處於學生運動的核心，而且這個運動轉變了歐洲，成為了一場文化和政治的

>>

歷史重頭戲。在關於這場運動的書籍之中，我想我的是最深受喜害的，因為我把這個運動當作是 1964 年後在 Berkeley 的言論自由運動之後最重要的運動，這是文化運動，而非社會運動。同時，我強調這個文化運動和正統馬克思運動之間的差別和矛盾，特別是托洛斯基和毛主義的詮釋觀點。我說這種是舊瓶裝新酒。所以我開始和保守教授和左派教授產生矛盾，可是我同意 Daniel Cohn-Bendit，他是無政府主義的反共知識分子，他在 Nanterre 對我影響最大。

我開始相信集體行動不可以從對於法律、傳統、支配價值的同意或不同意去定義之。這讓我開始了兩項新的研究理論。第一個理論主張是去研究集體行動。我不透過問卷訪談，而透過參與，透過和運動者辯論，和支持者辯論，甚至和對手辯論。這是在 Nanterre 後研究一個反核運動、學生運動、民族運動、工會運動的方式。這也變成我的樂趣，我參加了 1980-81 的波蘭團結工聯，智利煤礦和鋼鐵工會運動，我很高興。最近我和朋友參加墨西哥 Chiapas 的 Zapatista 運動。每個案例中我都會讓運動參與者知道衝突最有可能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方法很顯然反對功能論者的看法，把行動和系統看成是一體兩面。反之，我的第二個理論主張，就是我越來越相信：社會系統的邏輯和行動者的邏輯，或是說，那些達到高層次的創意和批判介入的行動，其實是相互矛盾的。系統尋求自身的整合和調整去面對外在與內在的變化，而行動者想要增加自身的自由度、自主性、尊嚴、責任。所以系統和行動者的衝突當然就會不斷上演。可是在社會中，若是內部控制系統很弱，然後環境不斷變化，系統和行動者的邏輯就會經常出現矛盾，儘管我們不斷地創新操弄民意的方式，還是一樣。所以全球化造成了高度複雜性，也造成各種衝突矛盾。

我們都知道社會學是誕生於工業社會中，這個社會有能力轉變環境和自身，並透過創造新的生產、組織、分配、消費模式，利用社會和經濟資源作為手段而達成目標。現在，社會第一次有辦法把自己看作有能力去轉變自己。這就是涂爾幹的基本主張：用社會事實去解釋社會事實。

第二個轉變也一樣重要，就是理性和市場化。這個邏輯不僅支配了生產，也影響了溝通和再現。所以社會和經濟行動者就會從新的領域中被剔除。行動者便得越來越沒有能動性，以致於只剩下工具理性。

今日，我們主要的任務是去理解社會情境和社會行動者如何和過往的工業社會有所不同。一方面，我們看到威權政府的出現；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的西方工業資本主義怎麼在 1929 和在 2007-2008 年被金融資本所取代。金融資本主義沒有經濟的作用，完全只是錢滾錢的遊戲。行動者只可以用普世價值去對抗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完全沒有出路。當人權的概念無法捕捉到戰後的想像力時，我們看到現在反而是人權和民主有辦法去產生社會和政治的力量，去反對威權和資本主義。

我們面對典型的工業社會是既遙遠又具有可能性。21 世紀開始於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以及在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然後我們看到的阿拉伯之春。民主的種子在各地撒下，出現新的力量。最近我試著去分析這個大的趨勢轉變，並寫一本書，叫做 *The End of Societies*。意思是指出代表自身去思考和行動的「社會」已經消失了，社會學家必須承認社會的概念不再等同於我們所居住的這個世界。而社會學雖然可以也被稱作「政治倫理」，但社會科學不會消失。



> 法律與社會學的對話

by Kalpana Kannabiran, Council for Social Development, Hyderabad, 印度, 橫濱大會計畫委員會委員, 2014, 女性與社會委員會 (RC32)

Kalpana Kannabiran是社會學教授，同時也是Hyderabad社會發展委員會的執行長。這是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由印度社會科學委員會支持。她2003年獲頒VKRV Rao Prize，表彰其法律社會學研究的成就。她同時也是建立NALSAR University of Law的創始者之一。在那裡她教社會學和法律已經10年了，從1999-2009。此外，她也是Asmita Resource Centre for Women的創始者，於1991年設立。其作品主要關懷非歧視、施加女性的暴力、合憲性、社會正義等等議題的社會面向。最近的一本書是Tools of Justice: Non-Discrimination and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Routledge, New Delhi, 2012)。在2012年獲得了Amartya Sen Award表彰在法學的社會科學研究貢獻。

9



Kalpana Kannabiran.

>>

我是在 Hyderabad 唸大學的時候開始讀社會學的，那時是 1970 年代。不過我其實那時不太知道社會學是什麼。經濟學那時不太知道社會學是什麼。、社會學、地理學這三者和其他學科，像是文學、心理學、哲學等等不太一樣，我知道我不喜歡後者，但是又不是很清楚前者。總之我就是去讀了。我上了一間國立大學，叫做 Nizam College in Osmania University。從那裡畢業後我就到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去工讀碩士和博士預備課程，後來到 Jawaharlal Nehru 去讀博士。大學教育在我那時候是很乏味的，乏味到你完全無法想像，碩士也是。

不過很幸運的，我在大學第二年的時候，我和一個女性主義團體有了很深的接觸。這個團體叫做 Stree Shakti Sanghatana，是一個對抗暴力和強暴的組織。我開始學習關於這個運動的一切，包括公民自由等，因為那時她們正在和後緊急時代的國家對抗 (1977-1985)。我很慶幸我可以近距離認識這個團體，認識公民自由，而我爸爸那時是律師，是 Andhra Pradesh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 的理事長，後來是 Peoples Union for Civil Liberties 的理事長。而我媽媽是作家與詩人，是只持公民自由運動的批判家，也讓很多運動人士到我們家裡。她也是 Stree Shakti Sanghatana 的成員，

也是 We Were Making History: Life Stories of Women in the Telangana People's Struggle 一書的共同作者。

見證這段歷史的經驗成為了我了解社會學的最佳敲門磚，也讓我了解到社會的不同與可能。從那個運動中我開始去認真看待社會，特別是從法律和激進政治的面向。不只是法律社會學，而是法律與社會學。我認為這兩個學科應該相互對話，才可以讓我們對正義有更深刻的認識。我對這兩個學科連結的興趣或許也來自於我在博士預備班時我的指導教授和她丈夫「意外」過逝有關（她才 30 歲，老公也是該系教授），起因於家中失火，留下一個 2 歲的小孩。我是她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學生兼朋友。而那個時代其實我在課堂上學不到什麼社會學，我是在校外學到了很多，但是我的老師們也都對我參加社運很苦惱。

我投身於政治和組織的經驗讓我有機會熟悉法庭辯論和法律詮釋策略，也讓我很早就去研究個案法、憲法、集會自由辯論、立法辯論等等。但是我也對憲法主義有興趣。社會和政治運動如何代表憲法？運動如何以憲法主義組織起來？什麼樣的立法過程讓運動開始和產生影響？2006 年的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Traditional Forest Dwellers (Recognition of Forest Rights) Act 就是一個例子。運動中的雙向關係讓憲法有能力反對國

家對人權的迫害。而國家和運動之間的辯證關係也相當有趣，像是研究最近 2012 年的新的性騷擾法案就是另外一個例證。換句話說，若我們把正義放在社會學研究的中心，那麼法律就是這個中心的環境。

我當然不滿意做一位只是關心法律議題的社會學家。我是一個女權組織 Asmita 的共同創始者，於 1991 年創立。我是諮詢者的角色，提供諮詢給那些受家暴的婦女。即使我是一個社會學博士生，熟悉法律，但是我還是沒有辦法從律師那邊得到答案。為了把這個專業的障礙拿開，我去唸了法學，拿到了學士和碩士學位。我不要繼續走法律的原因是我想不到法庭中去重複律師、法官等總是在做的事情：用法律解釋一般常識。我想要對基本的權利有更多的認識，而不是在法條上玩文字遊戲，化約真實狀況。然而，我更專住在怎麼幫助人們解除痛苦。

另外一方面，我也很驚訝社會學家對法律的認識相當有限。雖然很多社會學家對法律很感興趣，但是了解實在不深。儘管早期西方的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對於法與社會的關係研究很深，像是 Malinowski, Durkheim 和 Weber，可是在印度，社會學並非如此。很大一部份的印度社會學是研究卡司特體系，然後研究意識形態和結構怎麼再生產，怎麼生產支配關係等等，都是從情境

理論、從支配者的角度出發。要改變這個傳統需要很長一段時間，而現在我們開始慢慢看到不一樣的論點了。

我的研究就是上述從這些思考和傳統開始的。所以，一部分是研究犯罪法學的歷史成因以及在殖民時代的發展，以及怎麼演變成今天的性騷擾、性工作、死刑、同志行為的罪行化等等。這個聚焦在法律的社會學研究立法的政治、法庭、法律詮釋，增進我們對於意識形態如何作用在社會上，如何支配，如何影響法律裁判、如何侵害基本人權等等的認識。而且這個領域也關心社會和法律取得的關係。

第二大我感興趣的領域是暴力。當我在研究性別、卡司特、失能、弱勢者（性別和宗教）的時候，

我開始注意歧視、違反自由、暴力的三角關係。我特別對於理論策略和可能對於憲法詮釋的影響感興趣，看自由權利怎麼被侵害，怎麼造成歧視，像是「不可觸及性」（卡司特）、性控制（女性）、強迫遷徙（部落）、大屠殺暴力和貧民窟化（宗教少數）、無障礙空間和拒絕進入（殘障者）。社會轉變的概念要怎麼和革命暴力、甘地非暴力、Ambedkar 的反抗卡司特做結合呢。作為憲法的設計者和反卡司特的哲學家，Ambedkar 是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但卻是被主流學院排拒在外。我們如何復甦一種知識的歷史，讓這個歷史和憲法結合呢？

正義的問題是社會學和法律交界的核心問題，並且有兩個概念特別相關。第一是 Ambedkar 的概念：合憲道德必須取代

公共道德。這是一個被忽視了 60 年的理論，直到最近 2009 年 Delhi 最高法院才被重新提出，在 Naaz Foundation 個案中為性少數權利辯護。Ambedkar 只是提出而已。而要如何勾繪一個輪廓和大致的雛型以至於可以在社會科學中辨識出其正義的基礎？這其實呼應了 Ambedkar 認為要盡可能去想像各種連結正義的可能性。第二我感興趣的是 Insurgency 的概念，像是不服從、批判、反身性等等，這些和合憲道德的內容緊緊扣合，和正義更是相關。這是一個可以促成運動和社會轉型的概念，並提供了激進鬥爭的理論基礎。這也包括了從屬者詮釋合憲道德的可能性，尤其在社會面對歷史不正義時，讓我們可以去翻轉鑲嵌在定義中的壓迫者詮釋觀點。■

> 智利政變後 40年

訪談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Part2: 民主轉型的挑戰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宣讀新憲法宣言
(2013年7月)。

這個訪談聚焦在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如何看待獨裁對民主的影響。在學術生涯之外，他也有豐富的政治經驗，這開始於 1964 年於 Catholic University 學生會長的選舉。在讀採統治期間他著述和教課，但都在學院之外，也訓練了好幾代沒有什麼機會取得教育資源的學生。他也參與了重建社會民主的計畫，辯論民主轉型，也是教育部、文化部的顧問，還有高等教育委員會的委員。近年來他致力於新憲法的推度。他的政治生活和社會學家是密不可分的。

布：在上一期 (GD3.5) 的訪談裡面，你談到了 Salvador Allende 和 Unidad Popular 的失敗，特別是理論的失敗。讓我們回到獨裁垮台的問題上。這是怎麼發生的，又如何發生？

MAG：讓我們從釐清問題開始把。Unidad Popular 的失敗並沒有造成卡台，但是民權和軍隊的陰謀才是。這些都是美國暗中支持的。在 1980 年代的獨裁政府制定了一部全新的憲法，造成了兩種政治秩序。第一是從 80 年到 88 年，第二是從 88 年之後。第一個是獨裁的體制化，並且有憲法的支持。第二是一種威權的民選政府，軍隊具有否決權。你要稱限制的民主、受保護的民主等等，都

>>

好。但是為了要從一個轉變到另一個然後又要維持權力，Pinochet 必須要有些作法。

布：這就是公民投票進入的時間點嗎？

MAG：是的。他們選擇公民投票的機制，但是這個開啟了一個問題。第一，反對派發展出了強大的組織能力，反抗和持續的組織，讓人民參與。第二，這組織也讓不同的反對聲音集結起來，並且快速的轉變了社會地景，像是若化工會等等。而 82-83 的經濟危機開啟了一連串的抗爭循環，讓人民聚集在一起，一起克服恐懼和形成政治影響力。但是沒有任何的意見被提出來說要如何打倒獨裁。暗殺的計畫也失敗了。直到獨裁政府舉行公民投票企圖為 Pinochet 鞏固權利，反對黨卻沒有任何對策。雖然接受是很困難的，不過反對黨最終接受公民投票，而右派的支持者則說公民投票是錯誤的一步，因為讓反對派有機可趁。他們只知道怎麼勝選！

儘管這些政治上的操弄，反對意見還是多數。所以想要鞏固權力的公民投票顯然並不可行。而反對派只要有 no 的選項，那麼未來不怕沒有仗打。

布：這是個奇怪的獨裁終結形式：自殺。而公民投票邁向民主的結果為何？

MAG：其中一個結果就是趕走獨裁，但沒有廢除制度架構和經濟模式。這很重要，因為這是唯一世界上的國家在獨裁垮台之後卻沒有制定新憲法的國家。這也是唯一一個拉丁美洲國家沒有憲法委員會的國家。

但是這並不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在贏得公民投票之後和選舉，統治聯盟可以不用害怕威權威脅而改變政治體制。

布：歷經了這樣的政治轉變，最後走向新自由主義經濟了嗎？

MAG：你不太可能在不改變政治的情況下改變經濟。例如，你不可能在現在的憲法下建立一個國營企業。記得，這是一個純粹的新自由主義，因為這是獨裁的規劃。現在，20 年過去了，我們看到 Concertación 贏了 19 次選舉，讓國家的 GDP 從 \$5000 到 \$15000，然後，有 70% 的大學生其父親是沒有高等教育學位的。這都是因為經濟轉變的緣故。

所以 Concertación 說：聽好，我們做得不差，已經很成功了，所以為什麼還要改變？我們

已經把智利民主化了，而這也的確是大成就。此外，他們宣稱要矯正新自由主義。可是他們鞏固新自由主義，重新正當化。換句話說，他們失敗了，不能和 Pinochet 切割。社會經濟的模式還是老樣子，不民主。政治或許民主，但是政府一點也不民主。

布：你的意思是？怎樣可以在非民主政府下實行民主政治？聽起來像是列寧主義！

MAG：我的意思是，第一，憲法從來沒有被民主方式通過。所以這不具正當性。但是第二點，憲法開創了一個政治體系，體系中支持獨裁的少數和反對的多數擁有一樣的選舉權。這個選舉系統讓選民很難在同一個政黨中選出兩個候選人，即使該政黨擁有多數票。所以立法委員總是很分裂，但是改變憲法又要 75% 的同意，所以很難。那這到底是什麼憲法？這是一個維持經濟體制的憲法，只有一行關於生命權，確有 3 頁關於財產權。

布：所以社會經濟秩序怎麼個糟法？看起來應該是往好的方向才是？

MAG：我想那是一個絕對的失敗。只要關於經濟模式，沒有一件好事情。這是因為銅的價格，因為 Concertación 攻擊貧窮。解決經濟危機並不是靠這個經濟模式，而是政府的對抗循環政策。

布：模式沒有不好，而是結果？

MAG：不，不，不是這樣。在 70 年代智利有世界上第二平均的收入分配，我指在拉丁美洲國家之間。2000 年卻變成了第二最不平等的國家，僅次於巴西而已（烏拉圭或許最平等）。收入分配是世界上最差的幾個，最好的是瑞典。第二，沒有其他國家的教育系統比智利更隔離排擠的，你會看到居住、階級、收入等等都是很顯著的因素。在 70 年代，可以確定的是，75% 的學生在公立學校，現在只有 35%。所以你沒有社會，有的是市場，和國家的一些管制。這裡有政治和社會之間的一個斷裂，所以若是中國和銅礦不見了，整個國家就不見了。這個模式是以出口為導向，出口貨物，也出口債。勞動關係也是世界上很差的。只有 8% 的勞動力有集體議價的權利。這也是最不管原住民 Mapuche 的國家，沒有政策。最後，這是很愛抗憂鬱藥物的國家。

布：但你不是早先說貧窮已經不是問題了嗎？

MAG：若標準的方法被採用的話，貧窮會從 50% 下降到 15%，可是你知道的，人們今天不窮的，可能明天就掉到貧窮線以下了，這根本沒有社會保護可言，

布：好，我想你已經辯護得很清楚了。現在讓我們談談學生運動。什麼樣的程度這代表了不平等？什麼樣的程度學生有自己的政治議程？

MAG：對於學生運動有幾種詮釋。有人說那是中產階級運動。學生不滿意，所以上街頭，要求更多。不滿是社會運動一個很重要的面向，但是這沒辦法解釋什麼。若我們談論不滿，那他們的家長會最不高興，因為他們要幫他們的孩子付學費。

最重要的學生要求是公共教育，包括三個元素。第一，公共教育系統必須是多數受會的。你可以有私立教育，但是要管制。第二，法律必須禁止營利學校，禁止營利企業對於教育的介入。第三是要求免費的高等教育，停止補助私立高等教育。

可是你不行對所有人開放免費教育卻沒有收稅配套改革。若是布爾喬亞的小孩也是免費上學，那只能是他們有繳稅。這一來需要改革經濟架構，也意味著要改政治制度才行。

布：所以你說這是革命的需求嗎？

MAG：我稱這是基本需求，這和要求更好生活不同。我認為學生運動在智利也是扮演一樣的角色，沒有跟政府與政黨接觸，這和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一樣，叫做去打破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所以這個意義之下，是可以稱作「革命」。可是在方法的意義上，這不是革命。其他的基本面向是這個學生運動是第一個當代的社會運動，是智利歷史上的第一次。

布：所以私有化教育是以經濟模式為基礎，無法改變，除非夠過憲法和體制。而這樣的改變需要政治與社會之間關係的重新建立。可是看看已經在巴西、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的方式，那會把後 Pinochet 時代帶到更民主的方向上嗎？

MAG：在智利所有的歷史計畫都是透過政黨

和運動的連結：像是工業化是由人民前線（共產黨、社會黨、激進黨）提出，農業改格式由基督民主黨（教會和農民運動），社會主義是由 Unidad Popular（社會黨、共產黨、其他）提出。對於獨裁的抵抗則是由 Concertación 黨和共產黨一起，可是現在這個聯合已經沒有辦法深化民主了。有些新的運動出現又失敗了。最近的總統大選或許又有些新希望。Michelle Bachelet 被多數支持選上，而且她的主張就是制定新憲法。而多數支持選上，而且她的主張就是制定新憲法。她和其他社會運動的結合或許可以帶來更民主的參與和制度的創新，讓公投制憲有可能。新的民主憲法和憲法委員會將可以帶來政治和社會的新連結，創造新的政黨，等等。

布：你 40 年的經驗真的讓人印象深刻！這是對我和對讀者一個很好的教育機會！謝謝你！■

> 烏拉圭

拉丁美洲的先鋒

by Felipe Arocena,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Montevideo, 烏拉圭



在Montevideo的議會外要求大麻合法化。

烏拉圭是小國，只有3百萬人，但是兩項法案的通過震驚了全世界：同志婚姻和大麻合法。若是2012年的墮胎合法也算進去，那你要說這個國家不是在西方的前面那就說不過去了。

按照「婚姻平等法」的第一項，「婚姻是異性或是同性的兩人的永遠結合」。在2013年8月我們見證了第一對男同志的婚姻，接下來有更多對同志結婚。除了烏拉圭之外，兩個其他的南

美國家也有同志婚姻，那就是巴西和阿根廷。而其他12個國家也是，包括了瑞典了也是、挪威、法國、西班牙、冰島、比利時、盧森堡、荷蘭、單派、葡萄牙、加拿大、南非。多數是西歐國家。在墨西哥、美國、英國，這個法律只在部份地區有效。所以，若是用 José Guilherme Merquior 的分類來說，我們若說拉丁美洲是「另外一個西方」，同志婚姻是典型西方的產物，因為這個區域的世俗化、現代化、權利普

及。

「大麻管制法」在2013年通過了。這個法案說「國家法案說國家會負責大麻的控制、管制、進口、出口、種植、收成、製造、使用、儲存、販賣、流通。」大麻種植和家庭種植，每個家庭6個種植地，也都是合法的。沒有任何其他國家項烏拉圭這樣把大麻交給政府管理的。所以可能的影響有兩個。第一，可以把大麻和其他毒品區隔開來，也把相關的暴力阻隔開來。第二，這

其實也是對抗毒品的一個策略。烏拉圭總統 José Mujica 認為若長久以來的方案沒有辦法解決毒品問題，那麼應該換換新的方式，若是烏拉圭實驗證明了有好的成效，那麼其他美國國家組織聯盟 (OAS) 那些也在試試新方法的，或許也會考慮跟進。

在 2012 年烏拉圭通過了「自願中止懷孕」法案，其第二項說：「在前 12 周前，自願中止懷孕並不犯法。」烏拉圭是拉美少數國家允許女性墮胎的（其他有古巴、圭亞那、波多黎各、墨西哥）。女人的意願就是充足的理由。5 年前議會也批准了這個法案，但是前總統 Tabaré Vázquez 同時也是腫瘤學者反對。在辯論之中，兩個點很重要。第一，女性的墮胎權利；第二，地下墮胎醫院對於經濟弱勢女性的影響。

這三個法案通過了，因為執政的 Frente Amplio (Broad Front) 政黨擁有絕對的國會多數。這個政黨其實是個聯盟，包括中間到左派都有，是在 1971 年成立的，2005 年第一次執政，2010 又連任。同時，這些法案也有來自反對派的支持。當婚姻平等法的到多數立委的支持時，其他兩個法案則比較爭議，有半數反對。這個其實反應了人口的組成。

法案很明顯的反應的國

家的左派政府施政，而過去 8 年來因為擁有立法多數，也使得可以通過許多法案。但是這個可能是個過於表面的解釋。一個更深層的社會學理由是什麼呢？我們怎麼理解這個總是被認為文化保守的國家和拉美人口最為老化的國度呢？

有至少 4 個相關的因素。首先，烏拉圭社會是世界上最世俗化的國家之一。歷史學家 Carlos Real de Azúa 說過烏拉圭是拉丁美洲舊基督教天空中最黯淡的一顆星星。第二，這個國家已經在 20 世紀就有許多進步前衛的法案通過，像是 1907 的廢除死刑、1913 的女人離婚權、1915 的 8 小時工時、1927 的女性投票權。這個國家已經走得很前面了，使得許多國家害怕會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第三，即使人口老化，大部分的老人都是在 60 年代進步時代的小孩。第四，這個國家在過去幾十年來都很正面發展，像是政治民主的完善，經濟成長率在過去 10 年每年 5%，然後社會平等和貧窮減少，這歸因於成功的重分配社會政策。烏拉圭也曾經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一。

很有可能是在不久的將來，許多西方國家將會通過許多我們這篇文章所描述的法案，如此一來要說烏拉圭是人權的先鋒其實一點也沒

錯。同時，這些法律會遇到阻礙，也因為不同國家的文化而遇到的阻礙會有所不同，這將是很棘手的困難。



> 烏拉圭的公共教育有多麼公共？

by Adriana Marrero,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Montevideo, 烏拉圭, ISA教育社會學委員會委員 (RC04), 社會理論 (RC16), 人與社會(RC32), 和Leandro Pereira,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Montevideo, 烏拉圭



烏拉圭的議會外的抗議教師。

烏拉圭有 80% 到 90% 的學生上公立學校。是的，你沒看錯。私立學校比例不到 15%，這個數字變化不大。公共教育是免費的，從幼稚園到大學，甚至到碩士和博士。除了免費之外，大學教育是公開的，並沒有考試或是名額的限制和排除機制，所以所有的高中生的可以註冊入學。此外，儘管拉丁美洲的宗教普片，烏拉圭的公共教育是與宗教無關的，這從 1917 年就開始了，在 9 年級時，宗教課程是選修，可以不要選。還有，烏拉圭的女性比男性要有好學業表現，這個現象在新世紀一開始就如此了。現今的女性平均教育程度高過於男性。女性也佔了 4 分之 3 的大學生比例，研究所則更高。這種教育的「天堂」也是第一個採用 MIT 的「人人一台筆電」計畫，讓每一個老師和學生可以獲得一台筆電，免費連到國家的網路。現在連中等教育也納

入了。和烏拉圭的國花齊名 (ceibo)，所謂的「ceibal plan」讓每一個貧窮小孩都可以把筆電帶回家，學習、分享、娛樂。

你或許會假設這樣的免費、公共、公開的教育系統只適用在低人口成長的國家 (0.19%) 以及 22% 的人在 15 歲以下，然後氣候條件要好，沒有地理和文化的內部隔閡，這一切才有可能提供這麼好的教育。但是這並非事實。

按照 2012 年 PISA (全球學生評量資料庫) 的烏拉圭報告，「烏拉圭的不平等還是相當嚴重」。89% 的學生在非常不利的社會文化條件下學習 (level 2)，只有 13% 的學生除外。貧富差距所造成的成績差距，以數學為例，差了 170 分，這反應了很大的教育不平等。這項結果在 4 個循環的測量中是很明顯的。

簡單地說，最富有的學生平均成績是比挪威 (489) 或是美國 (481) 還高的，但是最窮的學生成績比卡達 (376)、印尼 (375)、秘魯 (369) 還低。更令人驚訝的是，高分的學生有 75% 來自私立學校。

若是 PISA 的資料不夠讓你信服的話，我們可以來看看國內的資料。是的，全球比較有可能不太有用，但是看看國內的數據，發現越高的教育程度排除掉了越多窮學生，這是因為有很高比例的輟學和留級生。根據 2012 年官方的家戶統計資料，有 95.3% 的 6-11 歲的小孩上小學，73.8% 的 12-14 歲小孩上中學，只有 51.1% 的 15-17 歲小孩上高中。最後，只有 23.7% 的 18-24 歲年輕人上大學。而若考慮收入的話，這個減少的趨勢是一樣的，3 歲的小孩中，最富有的家庭 10 個有 9 個上學，但是最窮的人只有 50%。22 歲之前的年輕人，富有家庭小孩有 57% 上學，而窮家庭只有 9%。

所以到底那裡出了錯？為什麼這樣以平等公平為原則的教育體系會造成這種不正義的後果呢？

我想問題在於「公共」的意義。烏拉圭的「公共教育」事實上並不是民主意義下的公共。所有的教育，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是兩個機構所管理的，其一是公共教育部，其二是共和大學。這兩個和政治是獨立開來的。雖然有行政院下有教育部，可是對教育卻沒有管轄權。即使憲法有說主權以民族為基礎，並且每 5 年有大選，可是烏拉圭人民對於教育沒有過問空間，不論通過立法院或是行政院都是如此。

同時，那些主導教育的兩個機構在憲法之外有很大的自主性，而且被企業利益所主導。公共教育部負責義務教育和教師培訓，但是素質卻很差，形同虛設。另外一方面，教師培訓仍然照著傳統的方式在走，完全沒有創新。此外，升遷以年資為主，完全沒有評鑑機制。而教師的聘用被該部門完全壟斷。不管怎樣，老師要被解僱是很難的。

中等教育是整個體制的主要瓶頸，因為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課程縮減導因於老師缺席，40% 的學生留級。初等教育中雖然老師足夠，可是留級人數也一樣很多。2013 年老師要求加薪，可是從左派政府 2005 年以來薪水已經節節高升了，高到起薪已經比教授超出兩倍。教師的罷工讓許多窮學生沒有課可以上。這還不包括其他的罷工，像是反對改革的罷工。這些罷工有些是由左派所發

起的。私立學校付給教師比較少的薪水，也不太理會這些抗議，所以沒受到罷工影響太大。從這個觀點來看，烏拉圭教育並沒有多麼「公共」。

在看到這烏拉圭教育在社會和國家權力之間折衝的特質之後，我們會發現公共教育塑造了烏拉圭的認同，並且讓公民不相信市場機制。(2) 而且教師工會導致了一種「重新封建化」過程。在打著「公共教育」的旗幟底下，他們宣稱要保護其商業利益，這是一種特權的展現，也是不負責的象徵，因為在面對教育不平等和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他們是幫凶。完全主導教育政策的工會拒絕外界的批評與討論。所以，烏拉圭打可以繼續讚揚公共教育，只是那一點也不「公共」罷了。■

註 1：「Ceibal」（一群 ceibos）是「Conectividad Educativa de Informática Básica para el Aprendizaje en Línea」的縮寫，叫做「資訊科技的線上基本教育連結」。

註 2：1993 年正值私有化的時代，有 72% 的烏拉圭投票反對公營企業私有化。

> 烏拉圭奇蹟

重分配與工會成長

by Marcos Supervielle,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Montevideo, 烏拉圭, ISA勞工委員會 (RC30)委員, and Mariela Quinones,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Montevideo, 烏拉圭

第二個左派烏拉圭政府於 2009 當選執政，期支持勞工的政策最主要就是透過工資委員會和三方系統去提高所有職業的最低基本工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執政黨相當的具有策略性去推動進收入重分配。最近幾年下來實質公司提高了 4%，最低工資則增加了 250%。在 2004 年的左派政府之前，平均薪水是最低工資的 6.5 倍，現在則是 3 倍。和常識相反的是，常識認為重分配政策減少了就業，可是這裡我們看到失業率從 13.7% 降到 2004 年的 6.1% 了。

再者，工作也在這個時期增加了起來。非正式勞動減少了，而社會安全的人數增加了，勞動權利

更多人享有。全職勞動所伴隨的其他好處，像是好的工作，從 55% 增加到 2001 年的 69%。在這段期間，青年就業也增加，罷工減少。那些公共工人總是被連結到公共支出的投票，私人勞動人連結到集體議價的限制，不過更廣泛的說，勞動衝突的確減少了。

所有這些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好的經濟環境。如此條件式增進社會重分配的必要條件，可是並不充分。增進平等是需要強大的政治意志，特別是那些重要的政策，例如過去就把貧窮人口從 40% 減到 12%，而赤貧則從 4.5% 到 0.5%。

我們注意到的是，一個重要的社會機制是工資

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有很久的歷史了，並且在第一個左派政府被重新規劃，然而成為政策制定很重要的一環。的確，工會率從 2005 年成長了 300%，而到達了 350000 的人數，2013 年則估計會有 380000，這是 12% 的總人口，或是 24% 的受薪階級。所以不只會員人數大量增加，還有新的工會出現，像是農業。

這個工會的成長有許多結果。一方面產生了許多古典的工會意識形態。傳統上，烏拉的工會和國家與企業是分開的，和政黨也是，左派政黨也不例外。後者的影響是透國左派領導的決心，透過民主選舉，使得有權力。其他的工會傳統是說每個公司都有工會，把工會轉變成微觀的政治系統，並和在

地議題結合。結果，中央的烏拉圭工會 (PIT-CNT) 總是包括了各種工會，雖然說全部都是左派就是了。

透過民主選舉，工會主義流失了政治的一致性，特別表現在領導上，並沒有把自己和歷史上的左派連結在一起。在意識形態的層次，在某些部門裡面，激進工會出現且發展出很強的反政府批判。在其他產業，企業修辭遍佈，把現代化國家和改善最低階級處境分開了，新的工會在某些情況下輩認為很有侵略性，並且似乎正在改變工會主義本身，還挑戰了新的圖像和創造了新的關係。實際上，一個新的企業復仇已經發展出來，甚至成為有主導性的意識形態。或許我們也看到了新的左派，正在傳

統的工會框架下運作，也有可能開創新的結構，給新的社會事業，並以勞動世界為基礎。■

> 烏拉圭 農業革命

by Diego E. Piñeiro,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Montevideo, 烏拉圭



今日的生質能源，明日的飢餓？

在2002年，一場經濟與社會的危機撼動了烏拉圭。這是新自由主義改革後的第20年。這一切是由傳統的政黨所領導。2005年，左派的 Frente Amplio (Broad Front 黨) 贏得了大選，於是開始重建國家。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國內經濟成長飛快，是拉美最快的國家，而重分配政策則是要削減貧窮現象，也相當成功。許多的成績是由於農業部門的快速成長，因為在那幾年來結構變遷有了徹底的改變。

所以烏拉圭農業社會

的結構在20世紀已經有所改變。在最高峰的時候，擁有許多牲畜和農業設施的人都大力投入出口產品的製造。也因為早期資本主義農業的建立，工人提供了許多農業的勞動力。可是，同一時間還有許多規模大的家庭製造業者。農人比佃農多。他們來自歐洲，主要生產內需產品。在新世紀一開始的時候，許多社會結構因為革命而有所改變。以下我會詳述。

自從上一個世紀結束之後，世界的食物市場需求也增加了，其他包括了

纖維、員物料等等也是。這個現象讓廣大的人口興起成為新經濟體。而新的消費者的出現也提高了產品的售價。因為這些食品的高需求量，烏拉圭歷經了土地使用的緊張期，而整個國家也面臨的新土地的剝削，用來種植種子和油品種子，而牲畜的產量也增加，導致了出口農產品的增加。這些生產型態其實很傳統。而政府的補助始於1987年，現在有超過一百萬公頃的森林，還有兩處紙漿生產第，都是由跨國公司所經營。其他也隨著生質能源的需求而

>>



同了。

這個巨大的轉變是由許多過程所導致的，且環環相扣。第一，管制架構的改變讓金融資本很容易進入農業裡面。第二，組織變遷讓公產，特別是網絡的企業型態可以把資本更有效的流通。第三，農業工作被外包到許多協力公司，他們有機器，然後利用期社會網路去僱用勞工。第四，科技變遷增加了生產者對於改造種子的依賴，還有化學肥料、以及新的機器。畜牧業裡就是使用疫苗等等維持動物健康的方式。

同時，新的資訊和通訊科技（電腦、網路、手機）也改變了農業公司的管理。這些把勞動力的組織改變了，把勞工和串連起來，連結到都市，改變了國家和都市的文化邊界。這種農業結構的轉變和農業人口創造了新的行動者和聯盟，要求國家和農業可以更民主、更平等、更永續。■

被產出，主要由國家的石油公司掌控。

土地價格提供了很好的指標來衡量農業的變遷。在過去 10 年裡面，土地的平均價格增加了 7 倍；最大的田地（超過 2500 公頃）則增加 12 倍。這讓大或小的生產者都賣掉了土地。結果就是成長的集中和土地被外國公司所把持。一項從 2011 年的農業調查資料裡面看到 2000 年時，57131 筆的農業土地到了 11 年之後只有 44890 筆。即使 91% 的 12241 筆消失的土地小於 100 公頃，可是顯現出的是小農的減少和地方畜牧

業的消失。

新地主的鞏固有絕對的文化影響力，這和國外擁有者增加無關。上述的資料也顯示了：雖然 90% 的烏拉圭土地在 2000 年是私人持有，11 年後卻剩下 54%。在 2011 年以前，43% 的烏拉圭土地由法人持有，這些都是國外人或是跨國公司。

因此，我們從畜牧農業到了現在的種植業，生質能源，然後被大企業所佔領，被機器所取代，大量的農業人口出走到城市，土地的高度集中，外國資本等等，今日的農業已經和半個世紀前大不相

> 匈牙利 的黑幫社會

by György Csepeli,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Budapest, 匈牙利



在受歡應的Hetí Világgazdaság (World Economy Weekly)的封面上，執政黨 (Fidesz) 被描繪為黑道。

者中沒有人期待可以轉型到新的秩序。一般人當人不期待改變，特別對於那些生意人和失業者來說，非選項之一。

在那些後社會主義國家裡面，匈牙利是以農業經濟企業最為著名的。Ivan Szelenyi 的書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中，在國家社會主義匈牙利有約 10% 的人口是從事企業工作。然而企業家精神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意義上來說不但被允許還被認為是一種非法的。Szelenyi 的「中斷的布爾喬亞化」是錯的。前社會主義企業家馬上認識到新的企業精神太過於冒險，而且多數會失敗。成功不過是偶然，不是實力。許多新的後社會主義企業家模式並非來自

過去 20 多年來，也就是從 1989 的 *annus mirabili* 事件以後，國家社會主義突然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主義。也就是這之後，市場經濟和民主體制出現了。當 Michael Burawoy 和 Katherine Verdery 在

Uncertain Transition 寫下導言時，觀察家對於這個歷史的詮釋相當歧異，分為「歷史終結」的大敘事和「新穎且未知的後現代性」這兩派。不過這兩種理論都不符合現狀。

除了幾位激進知識份子和共產黨人之外，當事

前社會主義企業家，而是高階黨幹那裡。

工人階級或是中產及黨幹部之中的許多人都要面臨失業。1.5 百萬的前破產國家經濟的受雇者因為從虧損經濟轉型到剩餘經濟而丟掉工作。收入和消費的差距越來越大，近幾年更是如此。邊緣化的人口包括了 Roma 人，老人等住在很遠的鄉村區域，無住屋者早已絕望。族群和區域的不平等是重疊的現象，導致了貧民窟出現在北匈牙利。歧視和貧窮文化使得 Roma 人處於痛苦之中。

除了物質的不安全，還有認識上的不安全。這種不安全是從對外開放各種競爭性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而來。Vaclav Havel 著名的住在社會主義裡的水果商所多：「活在謊言之中就是活在往言之中」。不論掌權者或是無權者，社會主義的相信者和反對者都認為真理與非真理是很清楚的，非黑即白。從黨國一體到多元體制，是與非的界線不見了，以前社會主義時代的是非已經消失了。人民要在各種真理和謊言中做決定，便得不知所措。思想的自由對於害怕思考的人們來說是

個惡夢。

這兩種不安全導致了民主的反抗，反抗自由主義。2010 民族主義陣線的壓倒性勝利來看，民主敗選了。在轉型的 25 週年裡，我們可能會看到匈牙利會回到國家社會主義，只有這次是以民族社會主義出現。

Bálint Magyar 說過，匈牙利社會可被稱為「黑幫國家」，這個黑幫機器裡面，社會團體非常分化，分裂成互不往來的次團體。或是用社會學的話來說，借用 Mark Granovetter 的理論，強連結的普遍造成了黑幫國家，削減了以若連結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結果就是國家的衰微與經濟的蕭條。

統治者為了要確保執政，黑幫國家的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黑幫掌控國家，而被掌控者給予被統治者的資源就是一種象徵性的資本：民族主義。這個民族主義對抗自由，內外敵人通殺，認為這些敵人是共謀。內部敵人並不需要對抗，因為向來就是猶太人。外部敵人卻從因為再也沒有土耳其、哈布斯堡王朝、蘇聯作為敵人而改變了。新的外部敵人在布魯塞爾。歐盟變成了

匈牙利民族主義的敵人。矛盾的是，反歐盟的修辭故意對歐盟挹注匈牙利的資金視而不見。

黑幫國家生產了三種文化。第一是在內部統治圈圈內的問話。第二種包括了那些信仰黑幫的人，肯買單民族意識形態。這些人可以三家民族族合作組織。他們的熱情來自於反共、對於前社會主義不正義不了解的人的收買。第三種文化是包括移民在內所建立起來的，特別在最近幾年內發生。Ágnes Hárs 的研究指出，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住在西 Transdanubia (鄰接奧國)，而老人則住在北匈牙利。這種現象促使了移民的流動。

然而對於那些還在匈牙利的人來說，重建社會信任是唯一的出口。換句話說，就是要建立發展社會合作的能力，讓彼此不認識的人可以一起合作。這必須打破那些小圈圈的強連結，建立一個充滿弱連結的共同體社會。■

> 當代匈牙利的階級命運

by Eszter Bartha,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Budapest, 匈牙利



蕭條的都市，以前充滿工人，現在滿街流浪狗(Balázs Gárdi)

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階級這個概念是否在後工業社會還有任何意義，或是說，我們學術可以透過把討論階級得到什麼結果？在論階級得到什麼結果？業東歐，階級這個概念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非常緊密，因為國家社會主義把工人階級視為統治階級。

而現實上隨著共產主義的迅速瓦解，1989年後所謂的工人階級歷史已經不再受歡迎了。這個事件讓馬克思主義中把階級位置和階級意識等同起來的論述徹底失去正當性。在1989年，有些東歐知識分子還是認為民主社會主義必須以工人統治為基礎，其他的團體像是改革者，則提倡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有些人宣稱社會民主必須以混合經濟和強大的工會。另外，也被廣泛接受的觀點還包括了工人階級不會支持資本主義復甦會甚至改革的集體主義替代道路。當然，這個期待錯了，而工人階級對於資本主義也沒有很強烈的排斥。的確，在東歐沒有任何的國家中有工人支持任何的民主社會主義替代道路。東歐政治和知識氛圍也沒有想要重新審視階級這一概念的意思，所有的階級理論

>>

都被認為不再有用，然後工人階級也總是輕易地被國家社會主義的歷史連在一起。就像知識精英總是想像一個布爾喬亞化的未來一樣，忽視工人的社會和政治角色。

那為什麼又要在東歐重新審視階級這個概念呢？所謂的「布爾喬亞化計畫」允諾人民一個快速趕上西方國家中產階級生活水準和普片就業與社會安全。而在社會主義垮台後的 20 年這個計畫似乎便得更清晰了。私有增加了社會不信任的程度，特別是在這後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比之前共產主義時還大。工業化帶來了失業，外國資本和本國資本也在不平等的基礎上競爭，西方知識分子把這稱為新自由主義對東歐的殖民。

針對什麼樣的新結構位置可以用來審視現在匈牙利的後社會主義資本經濟呢？我們可以這麼回答，那就是：和西方潮流一樣，工業部門縮減，服務業增加。此外，廠商外移到其他國家加深了西方和東方結構性的不平等。這解釋了在匈牙利為什麼資本家很少，但是無技術工人很多的原因。Szalai 認為一個雙重的模型是必要的，因為要幾當代匈牙利社會的跨國公司工人和本國廠商的工人。後者工資很少，是被高度剝削的「bricoleurs」，總是非正式的雇傭關係，相當不穩定。而前者可被視為世新勞動的貴族，很少或甚至沒有階級意識：再加上孱弱的工會，這些都顯示了匈牙利勞工階級是如何的成為「自私的階級」。(1)

可是，這些新的不平等型態在匈牙利沒有制度化。「這個市場經濟把我們踢走」是我工人階級受訪者的普片心聲。工人對於「這個資本主義」相當失望。他們的技術和知識背心的政府輕視，所以他們認識到雖然人們在 Kádár 政府下不平等，但是不平等卻在 1989 年後增加許多。我的受訪者多數抱怨他們的小孩在那些經理、醫生、律師等的小孩完全不能比，因為那些人的起跑線比較前面（像

是私人的語言課程、運動課程、舞蹈、滑雪團隊等等）。

然而這個對於新政府的批評是錯的，沒辦法成為真正成熟的反資本主義批判。工人典型上仍然期待國家可以保護本勞，避免不公平的國際競爭，把一個強國家和第三條路視為是正面的替代道路。這個反應可以說是因缺乏一個反資本主義公共領域，也因為工人階級此一概念的破產，另外加上深層歷史經濟因素所導致。

然而，這種匈牙利的方法也可以在其他西方國家牙利的方法也可以在其他工人階級此看到，像是美國：政治腐敗、階級分裂的加深、底層階級的擴張，工會的弱化等。試想看看以下這個情況是否可能：後社會主義國家是西方的縮影，意味著全球社會和經濟問題的相似性，加深了勞工之間的族群和民粹意識形態呢？在後工業社會裡，加上企業文化、天賦、成就、努力等因素決定了社會向上流動，以至於平等競爭變成一種社會可接受的不平等。這同時也是後社會主義資本社會的意識形態，比馬克思列寧主義帶來更多的幻滅。首先要知道的是，競爭從來就不平等；第二，由資本主義無情造成的社會和物質的不平等不再被人民接受。的確，許多人會用寡頭治理去交換社會正義。然而在這裡，希望民主的西方可以提供了東方一面發展的鏡子，而非顛到過來。■

註 1：Szalai, E. (2004) “Tulajdonviszonyok, társadalomszerkezet és munkásság,” *Kritika*, 33:9, pp.2-6.

註 2：這個研究的介紹，請見 Bartha, E. (2012) “‘Something went wrong with this capitalism’: Illusion and doubt in a Hungarian (post)industrial community,” 收錄於 Mathijs Pelkmans (ed.) *Ethnographies of Doubt*. London: I.B. Tauris, pp.191-225.

> 精英 的(不)負責

by György Lengyel,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匈牙利



喜歡運動的匈牙利總理。

匈牙利總理熱愛體育，特別是足球。他的演說結束詞總是「匈牙利，往前衝！」這句台詞是從 Berlusconi 借來的。匈牙利的足球現在沒能擠進排名，這和匈牙利的政治精英差不多，沒啥競爭力。在總理小時候家的旁邊有一座體育場，許多人並不喜歡，不過也有其他人表示可以接受。喜歡的人會說：「讓

我們為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驕傲。」副總理還是地方的政治人物時說過這麼一句話：「如果你一無所有，那麼你也沒什麼用處可言。」

這種心態在匈牙利的後社會主義時代就出現了。從 70 年代起，在戰爭時，私有化、集體化快速展開，但在數十年後，這一切轉變了成為一種半市場的共生經濟

>>

型態。於是看到了鄉村內概起了很多樓房。許多並不適合居住，可是卻成為了一種炫耀財。現在統治者精英拿來炫耀的就是那個體育場，他們不需要擁有它，只要後世可以把體育場和他們的名字連在一起就好，像是金字塔、凱旋門等等一樣的意義。

可是，匈牙利精英的問題不只是在他們浮誇、貪婪、低俗。真正的問題在於匈牙利的民主岌岌可危。這才是這些政治經應該負的責任。這不用說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而政治精英現只會做做樣子，毫無實際作為。

有兩個事件值得提出來。第一是精英壟斷的取消。也就是說，如果可以替換那些掌權的精英分子，那麼政治轉型將會加速進程，且不會造成社會震盪。這也會促成執政精英和反對黨精英之間的共識。1989的圓桌會議就是精英取得共識的很好例子。而且桌會議就是精英取得共識的很好例子。共識桌會議就是精英取得共識的很好例子。其實共識已經很清楚了，那就是議會民主、基本自由、多黨制、私有財產。政治人物必須尊重其他的正當性並遵守遊戲規則。若政治精英搞分裂鬥爭，只在乎政黨私利，

那麼並無助於民主轉型。

另外一見事情就是選舉時期的政治獻金。政治獻金的量已經超出正常可接受的範圍太多了，政黨的選舉資金通常是個模糊灰色地帶，但是確有能力左右選舉結果。上次大選，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黨和反對的社會黨用的資金超過了法定的三倍，甚至更高出許多。許多政治獻金法案提出了，可是卻遲遲沒通過。我想這不是匈牙利特有的情況，但是匈牙利受害很深，因為她正處在轉型期間。很明顯的，這就是政治精英的利益所在，盡量維護灰色地帶有利於他們選舉，但他們忽略了這壞處。更精確說，很明顯這不是好事情，可是精英都可以把這些說成是對的事情。

一位社會黨的前總理曾經創了新的政黨，暗批了兩黨獨大壟斷資金的不正當性，但是卻馬上被告了，在法庭上他把證據全部攤出來。我們不清楚會什麼他之前不講清楚。現任總理也提到大企業和政治家之間的勾結。一位結。也提民主結。也提到大反對派。也提到大企業和政前對派。也提到大

企業和政治總理派。也提到大企業和政治家之也理派。也提到大企業和政治家之間說理派。也提到大企業和政治家之間現在派。也提到大企業和政治家之間的在派。也提到大企業和政治家之間政治精英已經打造了一個黑道國家，因為政府可以操弄經濟和利用法律建立恩僻侍從體制。

匈牙利沒有無政府也沒有獨裁者，可是並不代表未來不會出現，特別是獨裁者。執政的保守黨擁有的保守黨表未國有的保守黨表未來會的三分之二多數，已經制定新的憲法，制定新的媒體法律，新的選舉法，新的勞動法。這些從未取得廣大的同意。這些法律大大削減了既有的權利，限制司法審查、戕害民主制衡的機制。歐盟的影響力有限，以及批判知識分子肌弱無力。總理的威權領導相當有害，而人民則也害怕不穩定，所以要求社會照顧和平等。

這些都鼓勵了民粹修辭和經濟自由的修辭，然後變成藉口徵稅，特別是對那些國外的銀行。也變成跟其他國家談判的籌碼。另外，這也有可能不是修辭，而代表的政治人物真正這麼想，要對抗外來資本

好讓國家免於「被殖民」。他們也考慮削減外部債務，總計GDP的80%。然而社會學家看穿這一切，因為這些社會工程其實是透過紮稻草人來鼓動民族主義。這個副作用就是會產生排外主義和種族主義政黨。我們在上次選舉中看見了這股反動力量的誕生。

三分之二的匈牙利人口不會說外文。國家的媒體把國外對匈牙利的批評當作污辱和攻擊。多數的獨立媒體選擇在英雄與愚蠢之間做出詮釋。現今的政治精英因為相當分裂，所以這樣的批評算有道理。但是1989的圓桌共識要被競爭的選舉所取代的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總理並沒有隱藏他想要克服這種分裂現狀的企圖，因為他開創了一種「力量的中間領域」

或是說，鞏固其領導地位。他宣稱，精英的責任就是要帶領大家開創一個更美好的社會。這是幻覺。在政治理論家István Bibó的眼中，這不是精英的社會責任。真正的是他們的自私與無賴，在釋出公共土地和用菸草攏絡樁腳的例子終究可以看出來了。Bibó的對手György Lukács曾說Dostoevsky是英雄，引領我們到真理處。可是現在我們看不到任何鬼影子。

2014年春天匈牙利將會舉行大選。這會是場自由的選舉，可是公平性就待商榷了。因為很有可能執政黨會利用執政資源去操控媒體和選民。

總理很媚俗，不怎麼重視政治理念。他其中一個演說中引用了一位冰上曲棍球員說的話：「滑向有冰的地方，而不只是在冰上滑。」這

或許呼應他的執政，他應該了解到政治人物應該去了解人民的需要，構想人民的未來，而不能目光短淺。不過顯然他並不了解這點，不知道目標為何，而且劃地自限，修改遊戲規則，最後哪裡都到不了。

只要還有選舉，那或許就還有機會改變現狀，這就是民主鞏固的真諦。不過這可能要花久的時間，而且我們的精英們顯然並沒有朝著這方向前進。■

> 南非

來自地底的女礦工

by Asanda Benya,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Johannesburg, 南非



Asanda和其他的工人正在休息片刻。

在南非的一處大礦場中有 48000 名女性礦工。其主要開採鉑和金為主。這些女性是主要的勞動力，除了採礦之外，還有打造支撐架、牽水管、操作機器等等，全都在地底下進行。

2008 年我花了 3 個月的時間去研究南非的鉑礦場。身為民族誌學者，我和地底女礦工一起工作和居住。我的主要

研究目標是理解女礦工所面對的環境變化。後來我從 2011 到 12 年又花了更多的時間在地底下做田野，這次我當纜線工人，並負責清理石頭然吊回地面，以便鑽鑿。

當我輪到早上 4 點的班時，我必須 3 點就從宿舍出發。若是住得遠一點的女礦工就要 2 點就出發。這些女性搭乘大



Asanda操作鑽鑿機。

眾交通工具，通常是搭巴士到鎮上，然後打計程車到宿舍，那邊會有公司的接駁車。這是一趟遙遠、危險、而且昂貴的路程，大概佔去了她們一個月工資的三分之一。你知道一個月工資多少嗎？只有 120-150 美元。

艱辛的路途並沒有隨著到了礦場就結束了，反而到了礦場之後更加辛苦。首先是要進到籠子裡面從地表垂吊到地底，大概有 2-3 公里那麼深。這個不過電梯那麼大的籠子幾滿了 50 多人。在這裡面呼吸可是要跟最靠近你的人同步，否則會很難過。而且裡面不能開燈，這是個不成文的規定。有些人會藉機亂摸妳的胸部等，因為他們知道妳也拿他們完全沒轍。

當妳到地底下時，妳會發現妳到了另外一個世界：黑暗、混濁、溼熱。礦場通道很矮，有時只有 1.2 米高，那妳就要用爬的，還要小心翼翼。有時我們要

花 8 個小時在這個地方，跪在地上，然後在鑽洞的時候要防止岩石崩落。這地方完全讓我覺得死亡其實就近在咫尺。

我什麼工作都要做，包括纜線、抽水、移開礦石、搬運、以及隨時待命支援。操作絞盤纜線是個複雜但是可能會致命的工作，包括控制纜線等。只要有一個小小不注意，就有可能亂掉然後打結。所以操作這種東西靠的是經驗，不是正規訓練就可以弄懂的。

我們除了要做所有的工作之外，身為女人，我們被認為是那些「真正」男性礦工的助手。他們什麼都要叫妳做，可是做得再多就只是幫忙而起，不是真正在工作。只有男人做的才算真正的工作。我們有時候也要當男工人的服務人員。每次要換班前，鑽洞後，我們負責要放上炸藥。

我很快學到，若要生存，那麼就要臉皮厚，並知道怎麼在地底作這件事情。

我在受訓時知道了很多規則，可是真正上工後學到的則是另外一套，這另外一套是由男礦工制定的。若不服從，妳就不是稱職的工人。為了被接受，我要學習怎麼走路、講話、工作、搬運、用燈等等。這裡有另一套地底的語言。除了 fanakalo 我還要學其他的語言。

礦場的暴力和危險，讓我們必須「忘掉自我」。有人跟我說，若把真正的我帶到地下來，那是很危險的。我真想知道我們要怎麼如何不是自己。後來我了解到忘掉自己就是要扮演另外一個角色。工人都說這叫做「地底的我」。這個我，必須冒險、忘掉家人、把暴力和性騷擾當作是文化。這個文化還把工人洗腦，認為每年死個 120 人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直到有認識的人死了，大概才會回過神來。不過那也不過兩天回過神而已，看到人被抬出來，隔天知道死了。過後又完全忘了這件事情，又回到地底下的我。

回到地面上，我一直在理解在地底工作意味著什麼。死亡作為解放和超越？那我的兩個身份呢？地底冒險，地上謹慎。我的同事很多人都有小孩在上學。我想，看著小孩能夠上學，那大概就是冒著生命危險的解放和超越吧。■

> 象牙海岸 手機的象徵資本

by Jordanna Matlo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Toulouse, 法國



手機作為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

在 Adjamé 的 black (1) 一書中有一個令人覺得可惜的一幕：那就是失竊的手機。上百人排隊擠在主要幹道上面，所有人人手一支手機，甚至更多支。他甚至更多支。們甚至更多支。可能小小聲說話、也會大聲喊叫。有些人用手和臉保持安靜，有些人則是多走幾步回應顧客的殺價。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的是年輕，有些年長，有些看起來很累，或是穿著星期五樣式的衣服。他們賣各種的手機，多數的功能只有很少部份的人用得到。若

是供給和需求有關的話，那麼象牙海岸 Abidjan 的手機市場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若我們看從 2008 到 2009 年 Abidjanais 的失業民眾的生活型態，我們會發現手機其實是該城市很重要的文化之一。從大城市的大手機公司廣告看板上可以看到：一個男人搭配一個受歡迎的女歌手，然後還有一支手機。這幅景象很有威力，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全國有一千七百萬的人擁有手機，而全國人口只有兩千兩百四時萬

人。可是別忘了 42% 的人口生活在貧窮下以下。而窮人用手機的意義，象徵性大過於實用性。每支便宜手機都可以鑲上很貴的外殼，即時功能並不怎麼樣。最便宜的二手手機可以只賣 5000FCFA 而已。(2)

當我遇到 Calice 時，他是一個 23 歲的小販，頭上戴著 iPhone 的耳機，儼然是個活廣告。但是，這只是看起來而起，因為他的手機沒電一陣子了，而且沒錢換電池。而那些配件則花了 27000FCFA 的頭期款，其尾款還要

40000FCFA 包括安裝費。對於男人來說，手機勢必被配件。在 maquis (露天吧台)，手機都放在桌上，或放著音樂，或是就是放著，然後一邊喝飲料。社會地位的標記所顯示的是一種被看見的民主方式，標示著現代通訊科技，更是這邊社會的重要象徵符號。

手機也和邊緣社會的匿名性遭遇在一起。名字和電話號碼，有時候單單只有號碼，就構成了 Abidjan 街頭塗鴉的元素。號碼被畫在牆壁上，或是在計程車上，可能還代表著希望可以那一天可以打給這支號碼。一位外國領事館工作的朋友說，他最後一天上班時，穿的衣服上面不是在鍵的圖案，而是手機號碼。所以號碼對某些人來說是某種非正式的社會紀錄，像是沒註冊的人、非法的、不被看見的人。號碼代表著現代性，也代表社會的距離，而你的通訊錄則代表了你的社會地位。我記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叫做 Doug MC 的音樂家談天，他拿出一本雜誌，指了一個在紐約表演的藝術家給我看。那是象牙海岸人。他秀給我他美國的手機號碼，並吹噓說他這位藝術家朋友常 call 他。此外，接電話也代表對方願意花錢打電話給你，重視你。你會表對方願意花錢打電話給你，重視你。看到不論在任何場合，像是公共場所、教室、婚禮等地方，手機應該要關振動的，但是大家都把手機

開很大聲。

若西方的刻板印象是男人要用車子去把妹，那麼在 Abidjan 則是用手機把妹 (而且把到以後還要送對方手機加通話點數)。我的還要送對方手機加通話點數朋友還要送對方手機加通話點數說友還要送對方手機加通話點數，友還要送對方手機加通話點數這種還要送對方手機加通話點數方式既是祝福也是詛咒，意思是給女方一支手機當作禮物，也是追蹤，因為男方會希望女方不論到天涯海角都會接電話。此外，手機也決定了窮小子的人生希望，因為就連最窮的地方還是人手一支。我問 Erick 他會不會想要把他那支只有 5000FCFA 的手機升級，他說：「當然啊！我是人啊，我可是有野心的！」Samuel 則解釋作為一個男人，有生理、情感、社會的欲望，是都必須被滿足的。此外他還說：「每個人都會因為這些東西得到快樂與滿足，像我就很高興有這支 Sony Ericsson 呢！」而且有時候還是越多越好，因為一個人有兩三支手機可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因為每支手機有不同的電信網路，這代表你可以有能力選擇便宜的費率去打給你的朋友。

不論手機是個好的裝飾、娛樂、或是拿來接電話，邊緣的 Abidjanais 人很少把手機用來打電話，因為只有撥打電話要付費，而且通常他們沒什麼錢。我接到的電話通常都是從

cabine 打來的 ---- 這是一種很常見的電話亭，有木製板凳和桌子，由一位年輕人負責營運，提供手機和任何電信業者的點數。通話點數最多可到 100,000 FCFA，買月多會附加月多的額外點數。打電話的人通常會馬上掛掉，意思是要對方打過來；或者是傳個簡訊要對方打過去。若要對方打過來，那通常都會透過 cabine 傳送點數給對方。但不像 tag 的是，這反映出了撥話和收話之間的階層關係。有錢人打給比較沒錢的人。非洲有頭有臉的人就是這樣維持其社會地位的。這種財務關係代表的不但是支配關係，還是種社會債。■

註 1：這被認為是 black (英文)，這個 Adjamé (Abidjan 最大的市場) 的部份通常就是黑市，有很多偷來賣的貨品。

註 2：我研究時 1USD 等於 500FCFA。

註 3：人們通常都常認為買為很為昂貴的貴手機是機一種儲蓄的蓄方式。式因為若需要現金的話，可

> 歐洲社會學年會報告 Torino 2013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國, ISA出版副會長, 2010-2014



在Turin的歐洲社會學執行委員會。

ISA 的出版委員會的任務之一是找人代表 ISA 去參加會議並撰寫報告。這篇文章就是報告之一。但是要怎麼報告個法呢？因為這場會議有 2600 人參加，有 4000 餘篇的摘要送出，其中 3200 篇被接受。所以任何的參加者都不可能親自參加所有的場次。所以我的策略就是盡可能參加各種主題的場次，拋開我個人的興趣，或是找尋新鮮的事物。我

也不確定這個策略是不是很好，因為我好像遇到更多的政策制定者而非學者。無論如何，我想這是很有趣的，另外一方面，社會學也更有機會被政策制定者所重視，這何嘗不事件好事。

時間安排是每場一個半小時，一場通常都有 3-4 篇文章，1 篇文章只能簡短報告。影響就是要嘛只能報告理論沒有資料，不然就是只有資料沒有理

>>

論。報告者可能時間還算夠，可是觀眾就沒有那麼多時間了！所以很難有什麼延伸的討論、發表等等。不過好處就是我們可以短時間內知道重點是什麼，例如：

-- 世俗主義不用被認為是現代性的基本構成。

-- 前共產主義國家可以被歸類為後殖民。

-- 商業娛樂的研究可以促進我們對文化階層化的理解。

-- 危機會帶來轉機，給年輕人更多機會。

-- 政府對金融危機的回應給健保體系的研究者有些用處，也要考慮到職業社會學的觀點。

-- 展演或是藝術為基礎的傳記方法可能對大眾來說並不是那麼可得。紮根理論對於歐洲認同的研究發現了8種不同的歐洲認同。

-- 老人發現弱現連結，結也就是連結是到結是其他

是邊緣是社群是的群是人，對他們來說有支持的作用，因為和那些親人連結所要負擔的責任比起來，少得多了。

-- 許多人（特別是德國和瑞典人）正從事時尚研究。

-- 家庭社會學長期忽略了那些獨居的人。

-- 極右翼的成功歸因於投票制度（強制投票、大賜宣傳、把對政治反感的人帶了近來），以及是否存在溫和右派有關。

-- 當代右翼政黨把焦點放在族群文化上，而非種族。歐洲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代罪羔羊，在西歐是伊斯蘭，東歐是共產黨歷史。

-- 許多使用次級資料的料報告，提供了描述，但是沒有解釋，認為若有更謹慎的質化比較方法，小一點和沒那麼形式化的樣本，會是有用的。

歐洲社會學會發行一本新期刊了。原本就有

European Societies，現在新的是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都像會員提供電子版，並由 Routledge 出版。第一期會在 2014 年 3 月初刊。主編有 Paul du Gay, Ricca Edmondson, Eeva Luhtakallio, Charles Turner。編輯有 19 人，可是很令人驚訝的是，沒有半個來自東歐。■

> 最後的宣布

拉美社會學會(ALAS) 第24屆大會委員會



「拉丁美洲的危機和社會浮現」是第29屆的於Santiago舉辦的拉美社會學會大會主題。

此次大會在智利的首都 Santiago 於 2013 年 9/29-10/4 日舉行，共有 4168 為社會學家參加，來自拉美和加勒比海的 30 個國家，總共有 33 個工作小組、79 個場次、86 個書籍發表、5 個全體場次。另外還有 12 項會前活動，可謂盛況空前。特別一題的是，為數眾多的年輕學者和學生的參與將會為這次大會和學會寫上歷史的一筆。

這一年也代表了智利政變的 40 週年，每

一位與會者都積極參與了相關主題的辯論，場內場外皆然。他們討論暴力事件、創傷等，保守派知識分子、政府、國際組織視為是資本主義在智力和拉美的充新建立。

今日的知識社群用想像力和傑出的批判立以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整個拉美的社會運動活力和能量也日益茁壯。最近的幾個運動是好例子：

-- 在美國的拉美移民爭取工作權、健康、教育、社會安全，追求

>>

安家立業的權利。

-- 墨西哥民主教師聯盟的鬥爭，希望擁有真正的教育改革和不再解僱教師 (1,200,000 人加入工會)。

-- 整個拉美對於自然資源的不當濫用和開發，像是石油、天然氣、礦產、農業、漁業、森林、海岸、水資源。

-- 哥倫比亞大量對於和平談判的要求將會為這塊大陸帶來真正的和解。

-- 古巴長期對於爭取自己國家主權和封鎖的努力。

-- 對於委內瑞拉、玻利維亞、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厄瓜多的國的民選政府的肯定。

-- 爭取民主轉型

-- 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對於健康、教育、社會安全、年金的削減。

-- 反對暴力、恐怖，爭取安全。

-- 反對整府的府敗、揮霍，特別窮人日益增多。

-- 恢復原住民真正的自主性和主權，包括了非裔和島嶼住民。

以上這些需要系統性的工作，由整個大陸的社會學家來參與。我們的社會問題包括了破壞、貧窮、排斥、危險、暴力、對於災害和經濟危機的脆弱。所以必須有 100% 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批判自由。政策必須增進社會福利，由負責的國家和人民一起打造。也要克服殖民的知識和權利，追求真正的學術自主，擺脫那些評鑑的束縛、享有真正知識交換的生產的權利。這些目

標是我們最基本的要求，也是願景。

我們的高等教育機構不論是公立或私立都必須要努力做研究，帶給國家和社會更好的利益和權利去維護正義、自由、多元。

ALAS 重視這些目標，標並標認為有為責任繼續推動和追求，讓更多的社會學家一起來參與，打造多元典範、務實經驗、自主認同 ---- 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願 ALAS 鴻運昌隆！我們的 America 生生不息！■

> 社會轉型和數位時代

by Elisa P. Reis,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前ISA執行委員, 2006-2010, ISSC的ISA代表



Elisa Reis是ISSC新副理市長。



Alberto Martinelli是ISSC新理事長。

「社會轉型和數位時代」是世界社會科學論壇的主題，由國際社會學委員會 (ISSC) 所主辦，在 2013 年 10 月 13-15 日於 Montreal 展開。超過 1000 名、來自超過 60 個國家的社會科學家、科學管理者、專家等就數位議題，發表了超過 750 場的報告，而且還有許多其他的附帶討論活動。全體參與的場次聚焦在當代社會的重要問題，吸引了為數眾多的觀眾參與，也帶來了很熱烈的跨學科討論。ISSC 邀請了請一個年輕的輕社運組織來報告，除了他們自己的研究之外，還提出了非常具挑戰性的問題，鼓勵

在場與會人士去合作從事研究。

ISA 所支持的場次是主要在加拿大社會學中所常見的議題，包括數位時代的利與弊，以及給知識生產的政策介入的機會。標題是「理解數位時代的社會變遷，2013 加拿大一邁向 ISA2018 世界大會」，四場報告相當代表了加拿大的社會學。Patrizia Albanese 是加拿大社會學會的理事長當選人同時也是 2018 在 Toronto 的在地委員會主席，和 Howard Ramos、Rima Wilkes、Cheryl Teelucksingh 等人讓我們看見在橫濱之後的世界大會有多麼令人期待。

ISA 也參加了「21 世紀

變遷中的地緣政治：人權和倫理」場次，由世界心理學會會長 Saths Cooper 所主辦，藉此期待下一屆的 ISSC 世界社會科學論壇主題：改變世界，邁向正義。第參屆社會科學論壇將會在南非的 Durban 於 2015 年 9 月舉辦，希望各位可以共襄盛舉。■

註 1：主編：恭喜 Elisa Reis 成為 ISSC 的副理事長和 Alberto Martinelli (前 ISA 會長，2000-2004) 當選 ISSC 的理事長。

> 俄國團隊

by Elena Zdravomyslova, European University at St. Petersburg, ISA執行委員(2010-14)

我們的團隊組成相當有彈性，核心的翻譯成員有Elena Nikiforova, Anna Kadnikova, 和Asja Voronkova，其他成員則是以輪值的方式付出貢獻，並其他新成員的加入。我們各自屬於不同的社會學機構組織，而計畫則是由St Petersburg的社會學會負責，這是俄國社會學會的地區分支。我們也很高興成為全球對話翻譯團隊的一員，讓我們可以知道全世界的社會學社群最新動態，也拓展了我們的視野。翻譯也讓我們學習到很多東西，這就是「做中學」的意義！希望全球對話繼續闡釋社會學多元觀點，並希望可以知名全世界！



Elena Zdravomyslova 擁有社會學博士，是 European University at St Petersburg (EUSP) 的教授，該校性別中心的執行長，也負責社會學獨立研究中心。其研究和教學的領域包括了：性別、女性運動、質化方法；專長領域包括俄國的性別關係、女性主義理論、照顧社會學、傳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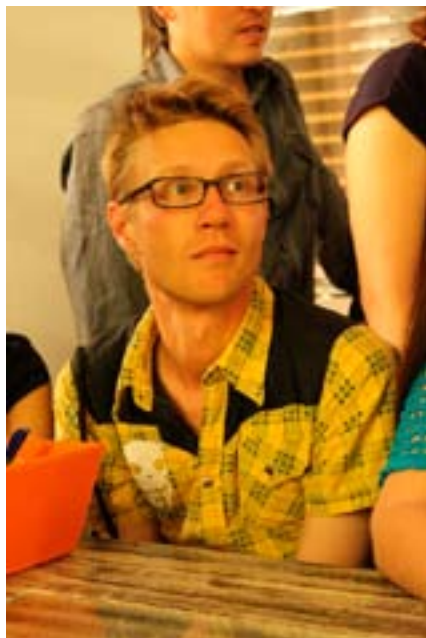
Anna Kadnikova 擁有社會學碩士，從 EUSP 畢業，興趣包括了俄國 pro-life 社會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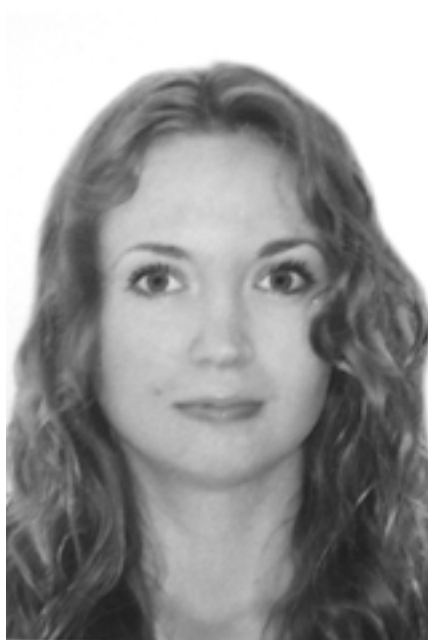
Elena Nikiforova 是 EUSP 獨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成員，擁有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的社會學學士，在該校國際關係進修，有愛爾蘭 University of Limerick 國際關係的碩士。她主要的學術興趣在於社會流動、空間，深受全球化和跨國化辯論的影響，並對邊界研究很感興趣。現在其研究專注在空間變遷、認同、生命歷程，以及這些現象和前蘇聯帝國的政治空間重組的關係。專長地區是波羅的海國家，西北俄羅斯、極北俄羅斯。



Asja Voronkova 是一位音樂家，也是搖滾團體 Patience Airways 的創始者。她從 Smolny College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和美國的 Bard College 畢業。其發表過搖滾樂的社會學文章，主要興趣在於極金屬搖滾作為年輕文化現象的研究，同時也是 *Laboratorium* 期刊的翻譯。



Alexander Kondakov 擁有碩士，EUSP 獨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成員。他畢業於社會學和法律的國際研究中心，興趣在法律社會學和酷兒研究。現在的計畫聚焦在俄羅斯的性公民權爭議。



Yuliya Martinavichene Humanities University (Vilnius, 立陶宛) 的媒體系教師，也是哲學系的博士候選人。她主要興趣在於視覺符號學、公共服務廣告、集體認同的社會學與哲學。她的碩士論文是研究白俄羅斯的戶外公共服務廣告與論述。



Ekaterina Moskaleva 是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社會學研究生。她的研究興趣在公共關係、藝術，過去主要參與兩個研究計畫：International Franchise Festival, Geek Picnic (計畫主持人) 和 Critical Mass 2013 (研究者和活動規劃)。現在她則在 St Petersburg 經濟學高中的計畫管理者。